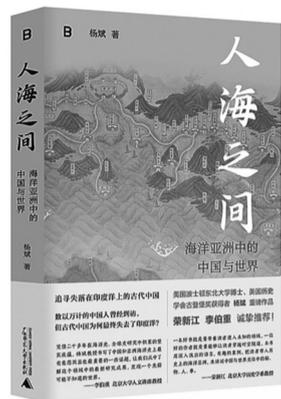


一料难求的龙涎香



《人海之间：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
杨斌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年9月

炼丹,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从秦始皇不惜跨海求仙丹开始,历代帝王自觉达到一定声望后,不由自主地都走上了求仙长生之路。明朝皇帝求仙问药的不少,其中最为疯狂的要数嘉靖皇帝,因为求仙炼丹还引起了一场弑君的壬寅宫变,被欺辱的宫女不惜用杀皇帝的方式来摆脱虐待。

关于嘉靖炼丹,史学界一般会提到一种叫红铅丸的丹药,这种丹药需要童男童女的小便或经血、乳粉、辰砂、乳香、秋石等材料。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炼这种丹还要一种非常稀有的材料——龙涎香。

大约在1542年后,嘉靖开始频繁搜购龙

涎香。但皇帝也不是什么都能得到,嘉靖屡次下令交由户部、内阁购买龙涎香,但十年间一无所获。他曾诧异地问严嵩,自己使用已经很节俭了,怎么内库就是买不来龙涎香。对此,严嵩的解释,无非是龙涎香产地偏远,百姓家中无所存,大家对龙涎香不熟悉,分不出真假,也不敢进奉。多年间解释来解释去无非就是这个原因。嘉靖发火也不管用,如此奇缺的货物,也让龙涎香的价格一路飙升。《明实录》记载,嘉靖四十一年(1562),户部尚书高耀购得龙涎香八两,献给了嘉靖。嘉靖大喜,回报他七百六十两白银,还加封太子少保。后来中国的海外贸易逐渐繁荣了起来,大批海外特产得以来到中国,这时人们才知道,在距离中国不远的印度洋,有着无比丰富的龙涎香。

龙涎香与印度洋的高度关联,也为人们揭开了中国探索印度洋的种种历史过往。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杨斌,以其二十多年来研究海洋史、全球史的经验积累,讲述中国的海洋史。为什么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曾经到访,古代中国却失去了与印度洋的关联?比起太平洋,印度洋与中国是如此地密切,但最后却只是成为历史片段?

古代中国同时也是海洋大国。本书围绕着中国与周边国家、人、事、物的交往。根据文献材料和考古发现,试图构建过去发生的历史,探索一个被隐藏被忽视的历史区域。

龙涎香早在唐朝便为中国人所知,这种

抹香鲸肠道的分泌物,主要产于印度洋地区。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都生活着抹香鲸,这种肠道分泌物并非印度洋独有。但是龙涎香被抹香鲸排出体外后,随波逐流,人们在海面上发现它的概率极小。像印度洋这样三面被大陆包围,还是亚非欧大陆的海上要道,印度洋岛屿众多,沿海地区有大量人口居住。这让印度洋成为有资料记载龙涎香最多的海域。

在印度洋上,中西海航必经之处的马尔代夫群岛就以盛产龙涎香而闻名。早在9世纪,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就注意到马尔代夫出产龙涎香。当时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曾提到,当海洋躁动不安时,海浪便会把大块的琥珀推到这些岛屿的岸边。10世纪的阿拉伯人伊布拉克在《印度珍异记》述要》中也讲述了类似的故事。13世纪宋代士人张世南根据历代文献,也对龙涎香做过全面的介绍。通过对中西文献的比较来看,大家对龙涎香的知识基本同出一源。这也让人们知道,为什么在中国,龙涎香与海上贸易的关联如此紧密。

书中开篇讲述了宋代海船泉州一号的故事,这艘远洋船在满载货物而归时,遭遇了洗劫,就这样沉没在泉州港口中。而后世的发掘在沉船遗物中发现了龙涎香,在第二、三、五、六、九、十、十三等舱底的黄色沉渣中,研究人员发现了与乳香、胡椒等杂物混在一起的龙涎香,经检验后,发现这些都是纯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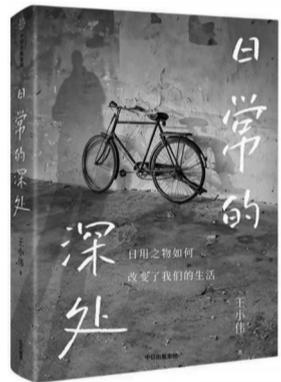
肖浩

极高的上等龙涎香。在宋代,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龙涎香从一种传说的香料变为上层人士使用的高级香料,在当时龙涎香就价值连城。宋徽宗的爱妃,死后被追赠为皇后的明节皇后,其仆人看见一海商在卖龙涎香,二钱龙涎香卖三十万缗。而明节皇后砍价,希望二十万缗卖给海商,但海商见价格如此低直接不卖。海商要价约二钱龙涎香一万五千两黄金。如此利润让龙涎香成为海外贸易的香饽饽。

即便如此,龙涎香依旧是极为稀少,南宋时期发达的海上贸易,使得货物流通,人们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到了明代,在郑和之后,开始了漫长的海禁,中国就很少见到真正的龙涎香。在明代,龙涎香也完成了从香料到药物的转变,其中最重要的过程就是前文提到的嘉靖时期龙涎香作为炼丹必需品的时候。一种香料将中国与海洋串了起来,那些与经济、文化、政治有关的过往,都成为海洋中国的往事。

这本书试图改变人们对于中国历史区域的刻板认知,在陆地中国与海洋中国之间,人们总是存在着一种一重一轻难以兼容的认知落差,其中有着农耕思想主导下的认知局限,那些史料中的海洋记载被认为是边角料,千年以来不为人们所重视。在海洋权益变得越发重要的今天,如何通过历史让中国与海洋接壤,这正是这本书的意义和价值。

隐藏在日常深处的灵光



《日常的深处》
王小伟 著
中信出版社
2023年11月

《日常的深处》,这本书就像作者“王小伟”这个名字的气质,朴实风趣、接地气。王小伟是北京的一名哲学教师,他每天在思考“生命中的真问题”,所以,这本书又很深邃、动人,充满了思辨,引导读者去发现隐藏在日常深处的灵光。

作为人类,我们需要的是生活,而不只是生存,因此,我们都是思想、有感情地活着,

而这思想、感情所牵系的,除了其他人,还包括我们日常使用的物件,正是寓于物件中的记忆,构成了我们生活的每个片段,从而形成了可以称之为“生活”的我们的日常。

全书的基调是回忆性的文字,浸染着怀旧的思绪。“70后”“80后”“90后”读到这些文章,一定很有共鸣。比如,那时候的农村都是自建房屋,盖房上梁娶媳妇,全村一起来帮忙;爸爸妈妈都要上班,电视机陪伴了孩子的大部分童年;的确良风行一时,老板们爱把高档香烟装在的确良衬衫口袋里,借助这种面料的透光度来炫富;“巨机器学校”对于效率和“质量”的追求;港台影视剧里那些手拿“大哥大”穿行闹市的大哥和他们的小弟……

透过记忆和共同经验,往昔岁月浮现眼前。在这些片段描写中,我们窥见了物质生活的变迁以及人们精神风貌的改变。物质文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幸福感”反而降低了呢?王小伟试图从“人-物”的关系去解释这个问题。

比如,老人爱国东西是个普遍现象,而年轻人喜欢“断舍离”。老人们经常说,这些东西不要扔,以后还能用得到。但是,我们都知道,大概率是用不着的,放着只占地方,讨人

嫌啊!我们也不爱听老人讲过去的故事,尤其那些饿肚子的往事。但是,刚刚过去的几年,恰巧用现实“教育”了我们,老经验有时候还是有用的。

我很喜欢王小伟关于老人的囤积癖的这段解释。他说:“对老人来说,旧物实际上是不是将来用得到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将自己看成一个有未来的人!”他说,每个人在生命意义上都是“老人”,因为每个“当下”都在过去,我们真正持有的只有“过去”。因而,我理解了这本书所流露的怀旧思绪,不是简单地怀念过去,而是在怀旧中寻觅当下通往未来的路径,为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寻找一条出路。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人-物”的关系。

这一刻,我想起父亲过世之后的那些天。按照风俗,家人需要将父亲用过的东西加以分类,有些与遗体一起焚烧,有些留作纪念,还有些需要丢弃。把那些零散的怀旧思绪,从各个角落找出来,集中一起摆放在客厅时,我曾经诧异它们的数量,那么多、那么繁杂,包括那些早就穿不下的旧衣服和过时的书刊,而母亲还知道,还记得过去的事情。她一边整理一边念叨着父亲从前穿着某件衣服去干什么事情了,父亲的那些老朋友,父亲的臭脾气,父亲

林颐

和她吵过的架……那些只有她知道,而且记得那么清晰的故事。每件东西,都在父亲的生命里有过特定的位置和瞬间,而在他的生命消逝之后,还有人帮他记得。

“你如何理解人,你就如何理解物,你如何看待物,你就如何看待人。”这就是王小伟所说的啊!

王小伟的这部著作融汇了回忆叙事散文、社会学观察和哲学随笔的写作特征。除了现象描述、事实铺陈、情感渲染之外,书中还有很多哲学层面的点睛、哲学家的语录。王小伟在序言里说自己有过把这部作品写成学院派理论分析的考量,我很感谢他没有这么做,能把哲学这把“屠龙刀”变作我们熟悉的“金针银线”,也有赖于王小伟幽默的语言表达。

现在的这部作品,它让我觉得容易亲近,它让我自然而然地潜入“日常的深处”,去捕捉生命的每一次灵光。物品承载记忆的功能最终会超越、取代它们真实的或想象的功能,而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在与物的交往过程中建构人的主体性,才有可能不为外物所拘,追求内心的幸福感,才有可能奢谈生活的意义。

华夏文明的见证者



《城的中国史》
许宏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24年1月

何为“城”?中国最早的“城”出现于何时?为什么说作为围城设施的“城”不限于城墙?城池为何而建,如何兴建?……在《城的中国史》这本书中,作者以时间为线,从距今9000年的中国最初的城池问世开始,直至明清两代,通过历代城池、城邑、城

郭的变迁,梳理了中国早期城市、国家和文明的发展轨迹,深入浅出地将复杂的考古学知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给读者,带领读者一窥中国古代文明的兴起与繁盛。

许宏,考古学者,主要从事中国早期城市、早期国家与早期文明的考古研究。作者30多年来在田野考古一线摸爬滚打,其学术生涯与城池这种“不动产”的发掘与研究息息相关。在本书中,作者对中国筑城史的考察跨越史前、原史、信史时代,宏观9000年城邑动态大势,梳理中国古代文明演化格局和发生发展脉络;从城邑和城市考古,升华到对中国“大历史”的把握,重构华夏文明,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华夏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

在人类历史上,大概没有哪个地域、哪个族群的人,比生活在我们华夏大地上的各个族群更喜欢筑城了。“无邑不城”,只要人扎堆的地方就得围起来。从殷墟甲骨文“邑”的用法看,显然它是殷商人对居民聚居点的泛指,都邑乃至大小族邑通称为“邑”。“城邑”不限于用城垣围起的聚落,围

围设施还包括环境、栅栏和部分利用自然天险(如断崖、峭壁、陡坡等)构筑的各类工事。其作用第一是区隔,第二是防御。城市,是一种区别于乡村的聚落形态,它比村落相对晚出现,仅见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较高级阶段,也就是国家产生之后的阶段。

城与郭的成熟形式,常见于社会复杂化后的国家社会,最后形成“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国家形态下的都邑功能分区。早期城邑直至早期城市,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迄今所知东亚大陆最早的城址,属于环壕类城邑。“这批环壕聚落见于浙江境内钱塘江上游的上山文化遗址,如义鸟桥头、嵯州黄山等。”城池时代的开端,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它昭示社会复杂化;邦国时代的城池,始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形态从圆形不规则到方正规矩,长江流域出现水城,黄淮流域出现土城,北方出现石城。

伴随着严重的社会分化而出现的、汇集诸种代表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最高水平的文明要素于一处的一些城邑,已步入初期城市的行列。它们的出现,标志着城乡

汪丽红

差别的产生、国家的形成和文明时代的到来。“一般认为,夏、商、西周王朝的都邑遗址是典型的中国青铜时代的城市遗存,是较为成熟、发达的文明社会。”约公元前1700年前后,伴随着区域性文明中心的先后衰落,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二里头出现于中原腹地的洛阳盆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

至西周之世,在西周王朝的三大都邑周原、丰镐和洛阳邑,都未发现外郭城墙的遗迹。然而,到春秋战国时代,却出现城建高峰。《战国策》形容为“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具有防御功能的城邑呈爆发式增长的态势,迎来了继龙山时代之后,以垣壕为主的城邑营建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期。设防城邑林立,与诸国争霸兼并、战乱仍频,进入分立的集权国家阶段的政治军事形势是分不开的。至此,以夯土版为特征的华夏城邑群,扩大至东亚大陆宜于农耕的绝大部分地区,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无邑不城”的新的发展阶段。